

《蝴蝶君》对性别和种族的解构

黄盛,蔡荣寿

(浙江传媒学院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作品《蝴蝶君》自问世以来广受关注,剧中通过性别角色的转换和种族关系的颠覆来阐述解构主义思想,表达了要求东西方平等相待的愿望。

关键词 蝴蝶君 解构 性别 种族

中图分类号 :I1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63(2009)01-0082-03

Deconstruction of Sex and Race in *M. Butterfly*

HUANG Sheng¹, CAI Rong-shou²

(1. 2.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Butterfly*, written by Chinese American playwright Henry David Hwang has received a large quantity of criticism.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deconstruction of sex and race in this play and Hwang's wish for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Key words: *M. Butterfly* deconstruction race sex

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Henry David Hwang)的戏剧《蝴蝶君》(*M. Butterfly*)自1998年问世以来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并获得托尼奖、普利策提名等众多荣誉,黄哲伦也以此成为美国一线剧作家。

《蝴蝶君》讲述了法国外交官伽利马和中国京剧名伶宋丽伶之间的一段长达20年的畸恋。宋丽伶的真实身份是中方间谍,伽利马因迷恋宋而泄露情报被逮捕。在狱中,伽利马得知了宋丽伶的真实身份和男性性别后抑郁而死。《蝴蝶君》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一个关于日本妇人巧巧桑为美国军官平克顿殉情的故事。事实上,黄哲伦在构思阶段就打算把《蝴蝶君》写成《蝴蝶夫人》的解构作品。他在《蝴蝶君》后记中指出,“蝴蝶”这个词在西文已演化为一个文化符号,指代东方女

性^{[1]2870}。黄哲伦试图打破东方女性沦为西文男性牺牲品的文化模式,在《蝴蝶君》中就东西方关系和男女地位进行了巧妙的解构。

解构主义源于20世纪六十年代,其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德里达指出解构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在传统的哲学对立中,并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要解构这种对立首就是在某个选定的时刻颠倒那个等级关系^[2]。”这里的传统哲学对立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体系中的二元对立,如白与黑、男与女、言说与书写等,在这些对立关系中,前者总被认为优于后者,代表先进和强势的一方,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3]。解构主义旨在消除此种绝然对立,打破等级关系和业已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收稿日期:2008-09-05

作者简介:黄盛(1982-),女,汉族,浙江杭州人,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助教,硕士。

蔡荣寿(1963-),男,汉族,广西平南人,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

一、对性别的解构

在传统逻斯中心主义观念中,男性的社会地位较女性尊贵,女性总是和软弱、被动等词联系在一起;同样,欧洲白种人比黄种人和黑种人优越,后者是落后的、女性化的。黄哲伦当然没有迎合这中观念,他在《蝴蝶君》中塑造了一个平庸的白人男性——法国外交官伽利马,他相貌平平,事业也不成功。在白人女性面前,他显得十分软弱甚至恐惧,没法面对她们和他平起平坐的现实。他曾和一个叫伊莎贝尔的白人女性发生过关系,伽利马显得很被动,似乎被这个女人阉割了。此外,他的妻子海尔佳甚至怀疑他没有生殖能力,大大伤害了伽利马的男性自尊。然而在看了宋丽伶饰演的蝴蝶夫人后,伽利马的男性意识被唤了起来,他说:“我想用我那强有力的臂弯绕着她——她是如此的娇小,我甚至想带她回家,好好地保护她,哄她,直到她开心为止。”^{[1]2831}他痛恨白种女人的强势与主动,只醉心于东方女性的软弱、娇羞和保守。正如他所承认的:“所有的男人都想得到美丽的女人。”^{[1]2831}他认为东方女性的殉情是美妙的,女性应该“为不值得爱的外国佬死去”^{[1]2868}。在他见到宋丽伶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把自己幻想成为平克顿。在维持了20年的情人关系期间,宋丽伶总是表现得柔弱、娇羞,这大大满足了伽利马作为男人的虚荣心,他首次在男女关系中掌握了主动权。宋丽伶这只美丽的“蝴蝶”完全符合伽利马脑海中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使他逐渐建立起白人男性的优越感来,甚至在事业上都开始起色。

然而在戏剧的结尾,伽利马却意外地发现“蝴蝶”是个男儿身,并且还是个间谍。在长达二十年的关系中伽利马都没有发现宋丽伶的真实性别,甚至还以为“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其实在剧本中有好几处对话已经暗示了宋丽伶的性别。在伽利马和宋丽伶第一次见面时,宋丽伶说:“这样来考虑吧,如果一个要回国的金发女郎爱上了一个爱笑的日本商人,你会说什么呢?他残暴地对待她,然后回到家乡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她对着他的相片祈祷,并拒绝了一个年轻小伙子肯尼迪的求婚。然后,当她得知他又结婚了,她就自杀了。现在,我相信你认为这个女孩有点疯狂,是个傻子,对不对?但是,一个东方女人为一个西方人自杀了,

哈!这你就觉得这很美了。”^{[1]2832}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宋丽伶并不是伽利马刻板印象中典型的东方女性,他的话里带着一丝嘲弄,表达出对西文男性玩弄东方女性的扭曲心理的抨击。在两人第二次谈话中,宋丽伶要求伽利马为他点雪茄,这在一方面是一种挑逗,另一方面是一种男子气的举动。试想,一个被动东方女子怎么会要求对方给自己点烟呢?可是,伽利马早就被幻想中的“蝴蝶”弄得神魂颠倒,根本不会留意这种细节;而且,西文女性对他的一贯压制使得伽利马对宋丽伶的温顺更加深信不疑。在两人的交往中,宋丽伶拒绝为伽利马宽衣解带,他也没有勉强“她”,因为他以为一个正经的东方女性在爱人面前就是这么羞涩的。只要拥有征服的权力,何必要为难这只“蝴蝶”呢?伽利马被捕后,宋丽伶去狱中看他,打算脱去衣服显示真实身份,伽利马却被吓坏了。当她最终看到宋的裸体后,仍然不愿面对现实,承认“她”是男性,而宁愿“选择幻象”^{[1]2867}。

在整个事件中,伽利马都没有把宋丽伶当作一个平等的个体,只把她“她”视作玩物、附属品,以为可以操纵掌控“她”。东方幻象支撑着他的精神,一旦宋丽伶撕去性别伪装后,伽利马就失去了原本可以玩弄于股掌中的东方小女人,转瞬间变成了他人的玩弄对象,这当然是他无法接受的。

二、对种族的解构

伽利马和宋丽伶的畸恋不仅揭露了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还影射出西文人对东方人的偏见和霸权。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中提出东方主义是西文人支配、重建以及凌驾于东方人之上的一种方式^[43],东西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统治关系”及“复杂的霸权”^[45]关系。东方人对于西文人就是“他者”,东方主义就是西文人对东方人刻板印象的文化根源。美籍华裔学者金惠经(Elaine H.Kim)对这种刻板印象根据为,在西文人眼中,东西方人的差异就在于西方人“在体格上、精神上和道德上更优越”^[45]。在伽利马和宋丽伶几次接触后,他以为征服了这个东方女人,这不但满足他的男性虚荣心,同时也强化了他西方人的优越感和东方主义思维。当法国大使图隆对他谈起越南局势时,伽利马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有一种自然的吸引力”,“东方人总是会屈服于更大的力量的”^{[1]2846}。

这些话充分地表现了伽利马在征服东方女性后所表现出来的作为白人的优越感。就像女性在男性面前的脆弱一样,东方也一定会对西文的强大屈从。正如宋丽伶在法庭上的发言:“西文认为自己是男性的——大枪、大工业、大钱;于是东方是女性的——柔弱、纤细、贫穷……我是一个东方人,而作为东方人,我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男人”^{[1]2864}。这就是说,即使宋丽伶没有扮成女人,他在伽利马眼中也是一个女性人的角色。黄哲伦对华人男性这种看似女性化的刻画曾引起一些华裔学者的不满,比如赵健秀(Frank Chin)就指出:“白人对亚裔的刻板印象很独特,因为它彻底否定了男性气质。最糟糕的是我们因为女里女气、缺乏传统男性的创新、勇敢、强壮的品质而显得可鄙。仅有的事实是有四五个美籍华裔作家加强了这个刻板印象。”^[6]黄哲伦显然属于这四五个作家之列,然而他塑的宋丽伶并不是对白人刻板印象的迎合。实际上,在戏剧的结尾处,伽利马穿上了蝴蝶夫人的衣服,说着“我的名字叫雷尼·伽利马——也叫做蝴蝶夫人”^{[1]2869},随后自杀;宋丽伶身着男装,点着雪茄在一旁观看,此时,两个人的性别角色转换了,伽利马变成了殉情的女子,而宋丽伶恢复了原本的男性身份,冷眼旁观这个西方人死去。《蝴蝶君》这个题目的意思也逐渐显现。“M.”可以理解为法语 Monsieur(先生)和 Madame(女士)的缩写,在伽利马殉情后,他就成了一位男性的蝴蝶夫人;而宋丽伶则摆脱了一开始所扮演的蝴蝶夫人角色。黄哲伦在戏剧的结尾处终于完成了对《蝴蝶夫人》的解构,颠覆了东西方的强弱关系,消除了男尊女卑的父权制思想,因此,黄哲伦并没有迎合西文人的口味,去贬低华人男子形象,而是打破了西文对东方的刻板印象。

三、解构的意义

作为一个美籍华裔作家,黄哲伦十分清楚华人在西文社会的处境,他们在体格上没有西文人强壮,经济上没有雄厚实力,政治上自然就没有了发言权。华人男性是西文上人眼中的“他者”,是女性化的,无生殖力的。但是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世界革命的发展、解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华裔在美国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他们逐步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审视,力图改变以往的刻板印象。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黄哲伦用戏剧的形式对西文霸权进行了巧妙迂回的解构。赛义德认为作者手中的笔“就像他的阴茎一样是一种具有生殖能力的工具,具有创造后代的力量”^[7]。黄哲伦没有打用激烈的手段反抗霸权义,而是用写作这种方式证明华人在西文社会的存在,逐步恢复华人的男性气概。事实上,《蝴蝶君》获得的众多荣誉以及被搬上银幕恰好证明了西文人对其的关注和认可。美籍华人,至少在文学领域,正逐渐被西文主流社会接受。

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东西方文化正在不断地交汇、碰撞、融合。黄哲伦在《蝴蝶君》中以东方人的视角对西方思维模式进行了剖析和消解,向西方权威发出了严正的挑战。不过与西方霸权以及父权制不同的是,解构主义的宗旨是打破传统二元对立,消除等级差别,而不是使原来处于劣势的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所以,黄哲伦的结构策略是为了消除西方偏见和东西方的势不两立,谋求东西方的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在此意义上说,《蝴蝶君》并不是一部反美的戏剧,而“在人类共同平等的基础上为双方利益真诚相待”^{[1]2872}才是黄哲伦创作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 [1] Hwang, David Henry. M. Butterfly [A]. Paul Lauter.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M]. Lexington, Mass: D.C. Heath and Company, 1994: 2822-2872.
- [2] Derrida, Jacques. Positions [M]. Paris: Minuit, 1972: 39.
- [3] 程锡麟. 当代美国小说理论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117.
- [4]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 [5] 金惠经. 亚裔美国文学: 作品集社会背景介绍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5.
- [6] Chin, Frank. Come All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 [A]. Jeffery Chan et al. The Big Aii-ic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s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M].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91: 68.
- [7] Gilbert, Sandra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Imagination [M]. New Haven: Yale UP, 1984: 6.

责任编辑: 吴惠敏